

我的“故乡”

◆ 马 朵

② 幼稚园里配“糟糠”

周家花园非常漂亮，没有今天的南伶酒家，整个儿是个大花园。主楼体其实并不大，但在儿时的我们看来，底楼的客厅就是个广场，课堂和食堂全设在客厅。睡觉的顶楼甚至还有些矮。几年前，爸爸带着我和当年幼稚园的“小糟糠”去故地重游，站在当年我们的集体卧房里，我们俩先是对视发呆继而放声大笑，因为当年人小，晚上睡不着时，总爱望着雕花的天花板上路灯折射的梧桐叶发呆，印象中那可是个壮阔的穹顶啊，这会儿怎就低得感觉要压顶了呐！“成长”瞬间就突兀直白得具体极了。

偌大的厕所也就一个大人的坐便器，但剩下的地盘竟然就能够放整个儿一个小咪咪班孩子们的白色小痰盂。之所以印象极深刻，是因为托儿所规定孩子大便必须按时进行。十几个小同学挤一个空间，毕恭毕敬地端坐在一起，完成一个被拎走一个。唉，多大个事儿啊，竟然就成了我孩提时代的最难办的大事！就想快点出去玩儿，可屎巴巴却不听调遣啊！不过，这看似强人所难的“规定动作”，倒真让我受益一辈子，整个儿的健康生物钟就延续了近半个世纪。

具有时空穿透力的幼稚园教育不仅仅是这准确无误的生物钟，这间不过几年历史的小小托儿所，因为是上海文艺界自己的操办，在教学方面似乎还就是挺与众不同的。比如仪表，孩子们没有统一的校服，但男孩子们规定要穿那种带前贴胸的背带裤，女孩子每天早起要排着队被老师在头顶上别个和脑袋差不多大的蝴蝶结，然后才能够下楼开始一天的生活，这仪式让小小的孩儿们有了“见人一定要体面”的暗示。再比如，别有意

趣的劳动课，是让孩子们拿着一个小竹碗，到一个大麻袋里去挖起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珠子，老师给每个小孩发一根长长的线，让孩子们按自己的方式串起一个个项链似的珠环；交上去的时候，老师根据搭配的良莠给孩子们发饼干、糖果、苹果，三个等级你自己去争取。耐心和专注的劳作付出，糅合着天自然的创造力，启动了孩子们的创作与审美的能力，实在是妙！

每天睡觉时，得男女两个小朋友配对儿，两个小床并排安置，就为第二天起床，两个小孩子能够互相帮助对方拉上背后的背带或系上宝宝衫背后的三个小结子，这一对璧人儿回到剧团里总被叔叔阿姨们调侃成“小糟糠”。这样的设计实在很高明，因为每一对伴侣，在之后的幼稚园活动中就习惯性地成了互相帮衬的小搭子。这互助让男孩子有了男孩子的派头，女孩子有女孩子的模样儿——过马路、爬高、结束一天的活动爬上黑黢黢的楼顶去睡觉时，男孩子都会紧紧地攥着女孩子的手，因为老师们总在提醒“拉紧了，拉紧了”；女孩子被安排每天早晨要把小小的手帕折成条状，用小别针别在自己和男孩子的胸前，并且晚上要督促男孩子睡觉前把袜子折好放进鞋盒窿里。绅士和淑女就从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歪歪扭扭地启程了！

③ 爱上文学爱上书

上小学时，我已搬离了徐家汇，然而总是缘分注定，还是在徐汇区，我的文字生涯起步了。

那是小学四年级的暑假，因为妈妈必须住在单位里搞运动，所以我也只好跟妈妈一起住在剧团里。大人们天天开会，孩子可就太寂寞了！我一直讨厌知了的叫声，就缘于那一段暑热难耐的无聊岁月。一天下午，和蔼的资料室阿姨忽然对着躺在树荫下打发时光的我叫道：“朵儿，没事儿就来帮帮我，帮我把书搬到花园太阳下晒晒！都长虫了……”郁闷透顶的我一骨碌爬起来，就冲进了资料室。说是资料室，其实更像是剧团图书馆，当时已经成了四日的禁区。我根据阿姨的要求，又捆又扎的慢

慢地把一大批戏剧、电影、美术的画报以及许多泛黄的书，搬到了花园的大草坪上晒太阳；根据阿姨的指令展开一本本画报的当口，我不知不觉地就被吸引了，一屁股坐地上就看开了，直到阿姨喊：“这么大的太阳，要看坏眼睛的，快拿把伞去！”就这样，搬完就能饱览一大通画报与书的快活日子开始了，一连十多天啊！后来不晒书了我也钻在资料室里，就那个暑假，我自己成了蛀虫，从此钻进了书里，也由此喜欢上了文学，再后来，就干起了造书的活儿。

本版插图
叶雄



④ 情窦初开“避风港”

高中毕业那年，我染上了肺结核，休学在家不能够马上考大学了。因为是急性生发的，所以很快就被控制住了，但是，完全不能够吃力的休养生活是很乏味的。也就在这段日子里，我邂逅了生命里的第一场“爱情”。

初恋男友是妈妈同行的儿子的同学，因为关心我的休学待考，这热心肠的话剧子弟大哥总带着各种试卷与他的伙伴一同来探望我，于是，我也就认识了后来的男朋友。渐渐地，男朋友就自己来看我了，一来二去的就有了些不一样的感觉，直到正式约我外出单独见面。他选择的地点既不是他所在的长宁区，也不是我所在的静安区，而是徐汇区的康平路。

隐约感觉自己人生的某个历史时刻就要到来，我在约会前的一小时就赶到了约定地点，倒不是因为怕错过什么，而是好奇于一份莫名——康平路没有电影院也没有公园，为什么会约我到那儿？但当我踏着夕阳走近这条小路时，即刻被一股浓浓的绿意和隔绝喧嚣的幽静完全地攫取了！百十来米的一条路，一侧是我当时完全不知所以然的大机构，另一侧是特别整齐的带花园的联排别墅，还有几栋极有特点的单栋洋房。

斜阳穿过婆娑的树影洒落一地细碎的橙红，初恋的梦就要在这里开始吗？我屏息静气地期待着……一个高个子男孩向我走来，带着我熟悉又陌生的笑款款走来，走近时他取出书包里的两张报纸，我很纳闷，他指指我的身后，我不由得转过身，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要和我一起坐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建筑物大门边上的台阶上……在准备坐下前我拉开距离，跑到对马路仔细看了看这栋奇怪的房子，大门的设计极有特点，门边的围墙做成了阶梯，伸长出来拐向街边，变成通向二楼的楼道；而二楼的门又是常年紧闭的样子，于是，两边楼梯就分别成了小小的避风港。我们都还是学生，情窦初开，却没有能力谈所谓的恋爱，没有电影，甚至没有公园的门票钱，但我们是那么地想单独挨在一起，在一起坐一坐，聊聊彼此的爱好、梦想……

男朋友是学音乐的，他一坐下来就兴奋地掏出当时非常时髦的小型盒式卡带录音机，插上耳机，让我戴上半个，自己戴上另一半，接着就取出他自己一首首有选择地录制的卡带，小心翼翼地插入录音机，顿时《啊，玛丽》美妙的旋律就灌进了我惊喜的耳道，男朋友轻轻地俯在我没戴耳塞的另一个耳朵边，随着旋律给我讲解这个描绘一对恋人化解了误会重新欢聚奔跑向初识山坡上的情形的作品……

初春的晚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也吹乱了我的心。那个夜晚，连同那栋独特的房子，深深地嵌进了我的生命里……

初恋总是美妙的，但也是脆弱的；因为无条件，所以异常的美，也因为无条件，往往难以存活……我的初恋是一树的翠绿，不及金黄就随着秋风凋零了，但寄存我生命最初芬芳的石阶，却依然托举着康平路上那座独特的建筑，成为上海市政府命名的第一批城市保护建筑，以其卓尔不群的韵味装点着徐汇区独有的海派风情。

今天，我真真正正意义上“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就安在徐汇区。户籍本带我回到了“故乡”！我生活在我出生的国际妇婴保健院背后的衡山路上，我也在这条路上有了我自己的孩子……推开窗户，我能够看见我儿时的幼稚园青灰色的屋顶；我常常带着儿子徜徉在普希金广场的三角花园里；好多次步行穿过淮海路，去到我文学的麦加——安福路话剧团的大院，看当年排练厅再次改扩建的小剧场上演的话剧，坐在原来放置我睡过的道具箱的新位子上，我心满意足……

“故乡”啊，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就在眼前……

① 睡在剧团道具箱

我出生在徐汇区赫赫有名的国际妇婴保健院。每次路过医院时，妈妈却总是要说一句：“你就生在这儿！”说过好多次却总还要说的感觉，是我自己有了孩子后才明白的——女人生孩子，身体是痛苦的，但心灵上，尤其第一次，是伟大的甜蜜。讲一次嚼一回，糖似的。

妈妈是个话剧演员，她的剧团在徐汇区极其幽静的安福路上。剧团的大院是民国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官邸，那主楼里三扇大玫瑰窗，是我童年最美妙的旖旎。

大花园的花匠工作坊被剧团改成了排练厅，里面大部分是个舞台，外口的工作区只有几把主创人员坐的椅子，而演员们排练时是坐在沿墙的一排黑黑大大镶着银铁皮的道具箱上候场的。常有奶孩子的年轻妈妈把自己熟睡的孩子放在道具箱上，当舞台监督喊叫上场时，她们就撂下孩子，托同事照看一下，跑上台去演别人了！

我就是经常睡道具箱的孩子，且不是稀罕的特例。我母亲她们那一拨上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话剧演员，是新中国艺术界的骄子，我妈进上海戏剧学院时才十三岁，是从初中就开始了的，也就是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吧。培养他们的全是中国鼎鼎有名的艺术家，熊佛西是院长，朱端钧是教务长，他们算是斯坦尼体系的嫡传，我爸爸的导师列普卡夫斯卡娅就是斯坦尼的学生；而教妈妈他们副课舞蹈课的老师竟然是“中国的秀兰·邓波儿”——大舞蹈家胡蓉蓉。他们出了校园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上海实验话剧团，后来更名上海青年话剧团。剧团的演员就是上海戏剧学院自己培养的三届学生。

年轻的新中国和年轻的话剧团，艺术实践的丰富性是可想而知的。妈妈生了我满月后，就抱着蜡烛包里的我，排戏去了。年轻的女演员们是想象不到后来的“大革命”的，她们简单地憧憬着自己沸腾的戏剧人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尽快结婚生孩子”的计划，希冀尽早回到聚光灯下快意她们的演艺生活。所以，青话几乎有十来个同年出生的宝宝，“睡在道具箱上的幼婴期”就成了青话部分子弟共同的命运。

就这么折腾到18个月，我们这批孩子有了自己的新单位新群体——上海文化局托儿所咪咪班。托儿所位于徐汇区的岳阳路。这条在我看来梧桐迷人度至今全上海第一的小路上，有许多名宅子。北端的三角花园自上世纪30年代起有了俄侨设立的普希金纪念碑，所以上海人习惯称这区域为普希金广场。其中宋子文的宅子和法国领事馆（今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比较大；还有周信芳宅邸（今为上海京剧院院部），一院之隔就是孔祥熙的宅邸，毗邻是蒋介石送给宋美龄的“美庐”，陈果夫的房子也在这条街上。我人生的第一个组织就扎在“四大家族”包围的一代名伶周信芳的院子里！

